

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对公众的影响^①

◎[美]斯科特·斯洛维克文
张碧桂译

[摘要]本文围绕两本关于气候变化的小说——苏珊·嘉纳斯 2001 年的《碳梦》和麦克·克里斯顿 2004 年的《恐惧的状态》，重点讨论了信任的不对称现象和科学的不确定性。苏珊·嘉纳斯在小说中敦促读者思考科学在社会中的恰当角色；而麦克·克里斯顿在其小说中给读者展示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环保主义分子的漫画图，这些环保分子播下了怀疑环境科学的种子。克里斯顿的小说获得巨大成功，由此暗示“一点环境知识加上文学的雄辩可能是危险的”。本文还指出，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既有其正面力量，也有其潜在的危險。

[关键词]环境小说；生态批评；全球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112-10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男，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或简称 ISLE)杂志主编。

[译者简介]张碧桂(1962—)，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环境文学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Title: Science, Eloquence, and the Asymmetry of Trust: What's at Stake in Climate Change Fiction

Author: Scott Slovic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asymmetry of trust and the scientific uncertainty, focusing on two specific climate change novels——Susan Gaines's 2001 Carbon Dreams and Michael Crichton's 2004 State of Fear. Susan Gaines prompts her readers to ponder the proper role of science in society in her novel, while Michael Crichton presents a startling caricature of environmentalist in his novel, sowing seeds of doubts about environmental science. Ironically, Michael Crichton's State of Fear is a great success, thus suggesting "A little bit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a lot of literary eloquence can be dangerou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nd ecocriticism has not only its power, but also its potential danger.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ficti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trust; scientific uncertainty

①这篇论文是我书的一部分，书名为《像尤卡山那样思考：心系可持续文学》(Thinking Like Yucca Mountain: Taking to Heart the Literature of Sustainability)，文章从我的手稿衍生，最近刚刚在尤卡山上完成。尤卡山在美国南内华达的沙漠中，是美国拟定的核废料掩埋地。2005 年 11 月，我参加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道格拉斯大学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濒危的星球”，我在会上宣读了该论文，考虑到没有时间宣读全文，我一开始就作了总结：一点环境知识加上文学的雄辩是危险的。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我们只要从加勒特·哈尔丁 1985 年出版一本书的书名——《筛除蠢蛋：如何在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雄辩家的言论下求生存》(Filters Against Folly: How to Survive Despite Ecologists, Economists, and the Merely Eloquent)就能得知。但是，在当代谈论气候变化的文学语境下，雄辩——或至少是生动地——错误应用科学具有不祥的蕴含，特别是因为公众对科学群体的信任极易销蚀。我用了近 25 年时间肯定和捍卫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但此时，我被迫指出这项工作不仅仅具有力量，也具有潜在的危險。

一、环境科学的预测与预警

在其 1997 年的论文《科学家们为什么争论不休?》(Why do Scientists Argue)中,美国生物学家约翰·贾诺维(John Janovy)解释说,在科学发现的语境下“争论”是探讨知识如何取得进步,即通过观察,释义,反释义,借助精密工具反复观察,然后进一步释义和反释义等等。贾诺维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明确表明此书为“忙碌的人们”而写,如律师和商人。前言坦言:公众需要理解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些关于科学是如何运作,以便在公共政策背景下理解科学的举荐。考虑到他的许多读者在人口增长和全球气候变暖这类问题上可能会不同意其观点,贾诺维有意轻描淡写了 20 世纪 90 年代头版头条新闻中关于科学论争的具体案例,而他引用的唯一具体案例是气候科学,那时的主要议题之一。当时,联合国和世界气象组织的政府间小组于 1995 年提交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简称“IPCC”)(这个话题至今依然关系重大),被讨论特别多的是报告的第八章(有点争议的),这章根据 13 年前的科学知识得出某种结论,即关于人类行为对气候造成的影响。在审视这一争论时,贾诺维温和地总结:争论是科学正常的一部分,科学家“通常不会毫无理由地作出有争议的预测”——他表明这一观点是要反驳外行人的假设,这些假设认为科学家可能会因为与他们的研究有关,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提出有争议的话题。鉴于科学家不会轻易公布他们试验的预期效果,“因此,完全忽视科学家的预测,只因为这些假设‘尚未被证实’永远不是一个好主意。”^①

为什么科学家偶尔会冒险作出预测?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应如何应对这样的预测?贾诺维在他的讨论中暗示:对美国人来说,采取“预防原则”可

能是一个好主意。“预防原则”是欧洲各国环境部长在 1987 年签署通过的,当时他们正对北海环境恶化作出回应。桑德拉·斯坦格雷伯(Sandra Steingraber)在其引起公众瞩目的《居住在下流:一个生态学家眼中的癌症与环境》(Living Downstream: A Scientist's Personal Investigation of Cancer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工业废料和癌症集中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她如此释义预防原则:“公众和个人应该在危害造成之前采取行动防止危害的发生”,“有危害的征兆就应该采取行动,而不应该等找到确实会发生危害的证据,特别是假如延误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②尽管斯坦格雷伯是在具体的水污染和人类健康语境下讨论这一众所周知并且实用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许多社会及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全世界的人类应该以谨慎的行为或者继续我行我素的方式应对目前对气候变化的估计以和对地球的预测……我们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星球”。这一点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理解环境科学的工作;取决于我们是坚持预防原则还是以一种掉以轻心的态度面对。

在这篇文章中,我思考了为什么一小部分持“相反意见”的科学家和作家很容易就煽动起公众怀疑的情绪(至少在美国本土是如此),这怀疑足以拖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出台及其进展,而这些政策可能使我们的国家根据科学证据行事,依据国际公众的意见行事。本文的目的是想给戈尔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即“当我们星球未来的可居住性受到威胁时,我们是否该如此容忍呢”?我回答这个问题,部分是通过思考信任的心理学,即信任在民主社会中是如何运作以及它在政策形成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对既是新闻记者又是

^①John Janovy Jr., *Ten Minute Ecologist: 20 Answered Questions for Busy People Fac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p.103.

^②Sandra Steingraber, *Living Downstream: A Scientist's Personal Investigation of Cancer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Vintage, 1997, p.270.

小说家的作家如何让公众信任气候变化主流科学,或破坏公众信任气候变化主流科学特别感兴趣,如麦克·克里斯顿(Michael Crichton)和苏珊·盖恩斯(Susan M. Gaines)。

二、信任、科学的不确定性与警告的言语

近几年来,新闻工作者没完没了地讨论当代气候科学、政策的科学与政治学,最好的例子包括罗斯·格尔比斯潘(Ross Gelbspan)1997年的《暖气开着》(*The Heat Is On*)和2004年的《沸点》(*Boiling Point*),克里斯·默尼(Chris Mooney)2005年的《论科学的共和之战》(*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以及伊丽莎白·卡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2006年的《一次灾难的纪实:人类、自然与气候变化》(*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 Man, Nature, and Climate Change*)。默尼在《最大的骗局》一章中,主要谈论俄克拉玛州的参议员詹姆斯·恩霍夫臭名昭著的行为,身为环境与公共事务参议会委员会主席,他却干涉、阻碍美国立法者通过一项减少人类因素造成气候变化的政策。2003年7月,恩霍夫在议会大楼12000字的演说中,攻击IPCC报告所说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①默尼说:“因此,一片混乱开始了。假如恩霍夫的目的是想制造混乱,由于科学本身的不确定,那他的目的达到了。”^②默尼解释说,参议员恩霍夫和他的助手们在回应记者书面问题时,篡改了国家科学院的报告,这一报告准备回应IPCC最新刊出的文章。默尼说,“大部分的歪曲是利用经典策略以达到滥用科学的目的,即扩

大科学的不确定性”。^③他用下面的陈述结束他针对政客们出于政治目的滥用气候变化科学进行的讨论:

确切地说,仍然得由决策者决定预防措施的经济成本是否超过利益。但这关键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讨论。相反的,气候变化被保守派用来对付科学,至少像对付经济学那样,保守派依据的是令人震惊的被歪曲的事实而且更令世人震撼的是,他们不顾专家意见,不顾最权威可信的科学评估与分析。

假如这种状况继续恶化,它也将是悲剧。也许当今没有任何一种关系的恶化所导致的潜在灾难后果,会比科学与政策制定之间关系的恶化所导致的后果更严重……。恩霍夫议员和他的保守派同僚不仅阻止公众了解气候状况的严重性,而且制造混乱与不确定性以阻止我们有所作为。^④

换句话说,搅浑科学和技术包括诸如气候变化的问题的后果是严重的,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具有讽刺性的是,许多世界著名的气候科学家——包括本杰明·桑特尔(1995年IPCC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深受美国的欢迎;而美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贡献者——众所周知,它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以及其也一些有关气候问题的国际条约。

恩霍夫及其他保守的政治家和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埃克森美孚公司资助,该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经营的石油公司^⑤)所意识到的和主流科学共同体不得不意识到的是:想要阻碍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出台,就要在

① William K. Stevens, *The Change in the Weather: People, Weather, and the Science of Climate*, New York: Delacorte, 1999, p.229.

② Chris Mooney,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87.

③ Chris Mooney,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 p.91.

④ Chris Mooney,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 p.101.

⑤ 艾利希在《出卖科学和理智》(*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一书中,直接谈及企业资助的科学,当人们问“为什么一位合格的科学家会帮助传播‘怀疑的种子’,我们能想到只有两种理由:他或她认为科学的一致性是错误的(处于完美正当的位置,假如它是合理的而且有证据支持)或者享受来自反环境论者的财政支持(不是那么正当的)”。

公众的想象中播撒怀疑的种子,特别是在不提倡预防原则的社会中——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播撒怀疑的种子非常容易。近几年来,许多心理学家对“信任”作了经验性的研究,有力地指出这一心理现象的不对称现象。要建立信任不容易,但要破坏信任是轻而易举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在题为《感知风险,信任和民主》(Perceived Risk, Trust and Democracy)一文中调查了目前研究观察技术风险信任的重要性状态,该文收入在他2000年的《感知风险》一书中。他指出,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科学家、实业家的风险意识呈惊人的极化现象。心理学界的四个主要发现是:“(1)负面的事件(信任遭破坏)比积极的事件(信任的建立)更显而易见;(2)当事件引起我们的关注时,负面的事件显得比积极的事件更重要;(3)给这种不对称现象火上浇油或许是人类心理固有的特性——坏的消息(信任遭毁)的来源似乎被认为比好消息的来源更可信;(4)另一重要的心理倾向是,不信任一旦产生,只会朝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产生永久的不信任”。^①这些发现暗示:在环境科学和政策的竞技场上,公司的官员或政客——或公司资助的科学家想阻止环境法的正常运转,他们只需对谨慎的科学家和铁杆环境保护人士的言论撒下“不确定”阴影。人们可能会问,散布灾难论的环保人士可能同样会破坏工业的稳步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人类社会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引起气候变化的动力)。然而,由于在许多碳足迹严重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舒适生活标准的基础,灾难性的宣言必然要与“大众舒适”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相违背。换句话说,通常环保主义者要破坏大众对企业的信任比较困难;相比之下,反环保主义者要破坏大众对环境科学的信任却比较容易。科学的批评家不需要任何科学证书和理解

力,他们只要说对发现的结果“持不同的意见”,通常就足以在被动的公众中播下怀疑和失望的种子。人们会想:“好吧,我们至少应该等专家们把事情搞清。”但专家们当然永远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为科学是建立在不断寻找不同的论据和争论,以及迫切寻找更好的数据和更好的解释之上。公众不能理解主流科学和外延科学之间的区别,不能理解某一科学断言基本上尚未被科学家同行接受和这种断言在某一具体领域具有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这样的公众不具备与公共官员交流和谈论政策的基础。

这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具有特别的蕴涵,因为对气候估计和预测是特别的复杂和不确定的。公众应该如何理解桑特尔1997年回应IPCC批评家的话。他写到:“不确定性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部分,而不仅仅是气候科学,也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科学。尽管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搞清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类对气候影响有多大,但我们毫无疑问知道,燃烧矿物燃料已经改变了大气层的化学结构。”问题不是大气层化学结构的变化是否对气候产生影响,而是这样的变化在过去的100年已经对气候产生多大的影响,还将继续对21世纪的气候产生多大的影响。^②

我们总能更多地了解世界如何运作,以及我们行为的蕴涵,如在气候变化科学中,所谓的“温室手印”(greenhouse fingerprint)已经被证实完全是人类行为造成的。在一个敌视危险的社会,正如戈尔所指出的,忽视星球不可居住性的危险似乎基本上是不合乎逻辑的(或者至少气候变化会潜在地严重影响地球给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水)。然而,普通大众听到这样的论调,可能会想:“等你能告诉我气候变化的发展程度及其严重性,以及这对我和我孩子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再回来告

^①Paul Slovic, *The Perception of Risk*, London: Earthscan, 2000, pp.320-323.

^②William K. Stevens, *The Change in the Weather: People, Weather, and the Science of Climate*, p.235.

诉我该怎么做。”显然,告知公众当局处理气候问题时更是如此。比如,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进入21世纪的气候》(*Climate into the 21st Century*, 2003)陈述说:“在将来,我们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气候变化,这只是人类历史上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已经适应世界范围内多种不同的气候,因此适应气候变化可能是一种生存的选择。”^①当然,当预测成为一种描述性科学的时候,评价已发生的事或不容置疑的正在发生的事,采取有意义的行为或改变政策可能已经太迟了。有时即使是最初的预测刚刚出炉,就已经“太迟”了。我也应该指出,在许多情况下预测环境科学的重要目标是要被证明错误。阿兰·艾特克森(Alan AtKisson)在其1999年的一本书中说:“发布可避免的危险警告是不受欢迎的,”正如“卡桑德拉的困境”(译者注:卡桑德拉是特洛伊的公主,能预卜吉凶)被称之为:“无赢的机会。不能有效地传递信息导致灾难。被成功的理解意味着最终被证明错误。”^②

因此,在一个要证明我们的卡桑德拉是错误的民主社会,拥有信任的民众好呢?还是拥有质疑、好问的民众好?我会说,同时拥有这两类公众最好。我们所需要的民众是能意识到什么时候该信任,什么时候该质疑——应该意识到支持公共政策时,就有必要提出问题,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似乎符合我们世界观的社会。这种可能如何实现呢?在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民众有不同的

兴趣、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关注点。这当然是民主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在多元族群和个体中,要取得可行的一致意见是一件棘手的事。试图简单阐释一种中心世界观是不可能和异想天开的,想让大部分的美国人赞同这一世界观以便制定符合这世界观的气候变化政策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让世界上一大部分人赞成这一世界观。我确实意识到,当谈到技术发展时——如生物技术——美国人和欧洲人有一种重要的不同。欧洲人在制定法律和政策以指导技术应用时更可能坚持预防的原则。还有,正如深谙民意的阿尔·戈尔(Al Gore)所暗示的,想弄明白大部分美国人愿意接受危险的底线是个极大的挑战。我们愿意不遗余力和花大代价减少恐怖主义的危险,但至于防止和预防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却迟迟不采取行动。^③做个调查,询问普通美国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让他们陈述采取行动控制气候变化的危险和利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例如,在过去几年,有两位美国作家已经就环境问题说过许多,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R. Ehrlich)和安妮·埃利希(Anna. H. Ehrlich)1996年就他们的个人世界观作了如下陈述:

当然,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然而却是极不可能的。关于来自全球气候变化的反馈对人类都极为有利,我们的后代不会受难或者甚至可能获利。然而,大约有同等机率的可能,所有的反馈都“错”了,人类将面临气候灾

①William Burroughs, *Climate Into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P, 2003, p.214.

②Alan AtKisson, *Believing Cassandra: An Optimist Looks at a Pessimist's World*.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1999, pp.22-23.

③有些人也许会问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否会受主流媒体的影响,假如在过去7年里,主流媒体关注气候问题像关注“反恐战争”一样,与这问题有关的有趣研究是安东尼·莱西罗威兹2004年的文章《后天之前之后》(*Before and after The Day after Tomorrow*)。这篇文章调查好莱坞电影的观众,然后再决定一部虚构电影(影片明显带有灾难信息)是否影响他们对全球变暖的关注度,49%被调查的观众回答观看这部电影让他们有点焦虑或者更加担心全球变暖,42%回答他们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不受电影的影响,只有1%的人回答看完电影之后,他们更不担心了。由于从日报到故事片,媒体都开始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的主题,即使《后天》这部影片不用夸张(或有些人说用歪曲的手法)演绎,公众也似乎可能变得更加关注,更加担心全球变暖的问题。

难——大面积的农作物欠收，海边城市被淹没，岛国消失，热带疾病入侵从前的温带地区，巨大风暴导致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等等。我们相信腾出保险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明智的。理查德·林德真和其他温室反对派推荐如下策略：“……我们操心什么？”这样的策略是由于他们不同意那些科学家。这样的姿态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因此以这样的基础出台公共政策是糟糕的。^①

为回应戈尔关于美国人对全球变暖的危险有极大忍耐力的说法，艾利希之流以及其他许多人说：“我们不是在容忍这种危险！”问题是，在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在一个认为只懂一点科学知识最好的社会，如何用可理解、得当的方法告知公众目前的问题，不高估也不低估问题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不知是更好还是更糟，与公众交流重要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从物种灭绝到捕猎等——这个任务已经心照不宣地被移交给娱乐媒体了，如电影和通俗文学。

三、环境小说与气候变化的科学

这里，我想主要具体讨论两本有关气候变化的小说——苏珊·嘉纳斯 2001 年的《碳梦》(Carbon Dreams)和麦克·克里斯顿 2004 年的《恐惧的状态》(State of Fear)。^②这两部小说反映了持赞同意见的和持反对意见的文学艺术家积极参与讨论重要的环境问题。在其 1985 年的《筛除蠢蛋：如何在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雄辩家的言论下求生存》一书中，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指责环境作家“用诗意语言的光辉”来掩盖对科学的无知。尤其是哈丁批评约翰·缪尔一句很有名的关于

宇宙万物的名言，该名言经常被引用，即“万物相关联”。我想对气候变化文学说的是：有些时候，这些文学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气候问题所蕴含的科学和政治；其他时候，生动的小说叙事，加上用伪科学作为工具，可能降低公众辨别微妙和复杂的现象所传递的信息。

克里斯顿最畅销的小说《恐惧的状态》令世人震惊地展示了讽刺环保主义者的漫画，这些环保主义者都是恐怖言论的散布者，竭尽全力恐吓公众，以确保获得资金支持他们的活动项目。克里斯顿笔下的活动分子用大规模军事战略手段试图摧毁南极洲的大陆冰块，在美国西南部散播恶意谣言，怂恿说是海啸导致东南亚海底岩石塌方。这一切都是以公共关系的名义，公然蔑视科学发现，使全球变暖的理论大打折扣。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尼科拉斯·德雷克，可耻的国家环境资源资金(NERF)官员，沮丧地宣布：

我讨厌全球变暖……这是一场该死的灾难……不管用……那是我的观点。全球变暖让你筹不到一分钱，特别是在冬天。每次一下雪，人们就把全球变暖忘得一干二净。或许他们觉得暖一点也好。他们艰难行走在雪地里，盼着全球变暖。^③

对此，德雷克公共关系顾问，约翰·亨利回应到：

因此，你所需要的就是……分布好信息结构，那么，不管哪一类气候发生，它总能证实你的信息。这就是转换焦点与应对突发的气候变化，能让你利用所发生的一切。总会有洪水、寒冷的风暴、龙卷风和飓风。这些事件总能成为头版头条新闻，你可以声称每件事是全球变暖导致突发气候变化的例子。因此

①Paul R. Ehrlich & Anna H. Ehrlich, *Betrayal of Science and Reas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6, pp.140-41.

②根据 2005 年 2 月纽约时报刊登的爱德华·瓦伊特的文章，克里斯顿的精装版本书第一年就卖了 516000 册，当月，约瑟夫·L·巴斯特报导克里斯顿第一次印刷就印了 17000000 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珊·嘉纳斯的出版商创意艺术书局 2003 年倒闭了，《碳梦》的销售额不详。

③Michael Crichton, *State of Fea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p.295.

信息得到加强,紧迫感增强了。^①

《恐惧的状态》这本小说中的一群环保主义者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科学一无所知、欺名盗世,是一个伪科学大骗局的始作俑者。这正如霍恩夫参议员告诉他的美国参议员伙伴的一样。在小说末尾作者所附的结束语中,克里斯顿说:“我得出结论,大部分环境‘原则’,如可持续发展或者预防原则,目的都是要保护西方经济利益,在发展中国家构建现代帝国主义。当然,这样的说法很美妙,‘我们已经拥有我们的,但我们不要你们拥有你们的,因为你们会导致极大的污染’。”^②在这一点上,克里斯顿似乎与同时期的里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的论点不谋而合。格罗夫的书《绿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热带岛屿伊甸园和环境主义的起源 1600—1800》(1996)一书,暗示西方的环境主义与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吞噬当地文化和物理环境有极大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对环境主义极左的批评。从各方面来说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克里斯顿的《恐惧的状态》获得了石油地质家协会 2006 颁发的新闻奖,这本书是小说而不是新闻,它是一部指责环境保护主义者种种罪行的作品,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帝国主义”。

小说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约翰·肯纳领导一帮克里斯顿的律师和慈善家极力阻扰环境激进主义,冷静地引用科学文章和恐怖分子 ELF(地球解放阵线)的言论,然而他们却代表美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机构,该机构的目的就是保护美国生活方

式。在 2001 年 9·11 事件之后,小说家把环境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联系起来是一种特别极端的举措。利用公众的恐惧心理,布什政府努力把当局描绘成一个强大和有尊严的国家安全捍卫者。尤其令人吃惊的是,鉴于小说的暴力传奇,克里斯顿在叙述过程中都附有脚注,引用诸如《冰河学》杂志和《美国气象协会公告》这样的期刊。这暗示了当他的主人翁——通常是肯纳——反驳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理论时,所用的信息都来自真实的科学。由于无法反驳教授的科学主张,小说中几个温和的环境保护者最终改变自己的信仰,皈依了肯纳,帮助他阻止地球解放阵线的活动分子。在作家简介一节中,作家的评论态度显得很中立,在某种程度上说,很民主,这就诱导了进步的读者欣赏其揭露全球变暖的叙述。在许多情况下,这是极富修饰作用、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③

克里斯顿小说中主人翁肯纳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似乎有点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理查德·林德真,他的著作在小说大量的参考书目中被多次引用。是的,在参考目录中,林德真的作品被引用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作家的都多。新闻记者罗斯·格尔比斯潘详细描述 1997 年林德真对待气候问题的态度。在《暖气开着》一文中,他详述 1995 年到教授家拜访的情形:“他和他的夫人都是极为高雅和好客的人,这与他经常发表严肃的科学论调形成鲜明对比,我发现他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表述明白易懂、简洁、一点也不含糊。我觉得他是我所采访过的,在意识形态上表现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之

①Michael Crichton, *State of Fear*, p.314.

②Michael Crichton, *State of Fear*, p.571.

③人们可以写一篇完整的文章谈论克里斯顿《恐惧的状态》一书中折中的、兼收并蓄的参考书目的修辞功能,在虚构的作品中如此标注作脚注的文献,且贯穿整篇小说的叙述,这暗示了作者要让读者相信他想象的叙事实际上是依据气候科学准确和公正的评估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仔细一点阅读克里斯顿的参考书目就会发现,他有意反对预防原则,他严厉批评科学家、新闻记者——从雷切尔·卡森到《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作者,再到评论罗斯·格尔比斯潘“过分地夸张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p.59),然而,他极力赞美理查德·林德真的气候研究(而林德真的研究深受其同行的质疑)。他标榜自己是用了“条理清晰、冷静、干脆”的口气,冷静地解构环境论和科学的教条(p.595)。他认为自己与艾尔斯顿·蔡斯和比约恩·隆博格两位高姿态的传播怀疑种子的作者是同盟。

一。”^①正如格尔比斯潘看透理林德真优雅好客的外表,弄清楚他意识形态极端个人主义角色在国家制定气候政策时的影响,^②我认为,不管是克里斯顿的小说或是其他的小说或是纪实小说,即使读者读到了一个迷人、透亮的故事,也不能代表它是最后的结论,因为气候问题是个复杂、令人费解、尚无根据的现象。实际上,这种似乎权威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叙述漂浮于大部分科学家的观点和书写之中。然而,在今日的美国,人们表达某种观点不需要知识。事实上,2005年9月28日,参议员恩霍夫让小说家克里斯顿在美国参议院闪亮登场,作证反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筛除愚蠢”在哪儿?2005年,克里斯顿就环境和公共工作在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作了证词,他说:“集中力量研究气候科学,如今对于政策问题给予可靠的、独立的、可信的答案是如此重要。”但是,即便是在呼吁好的气候科学时,他也含蓄地贬低和否认现存的科学。在2005年一篇题为《麦克·克里斯顿和全球变暖》(Michael Crichton and Global Warming)一文中,布鲁斯金学院的大卫·桑德洛(David Sandalow)说,《恐惧的状态》是以“愚蠢著称”,他总结性地:“克里斯顿书中的所有论点应该有更高的水准”,“假如就气候变化科学他有严肃一点的东西要说,那他应该选择纪实文学来表述,并递交同行审阅。”

显然,我极不赞成克里斯顿公然扭曲环境科学家和小说中行动主义者的形象,不赞成他就气候变化问题在国会的证词,似乎他个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观点与那些在实际研究这一现象科学家的观点有相同的分量。鉴于信任的心理,明显令人担忧的是:只要有一个非专业人士说出否定的观点,也足以动摇立法者和公众对真正环境科学的信任。正如心理学家所说的,来自一群真正专家的声音,也极少能胜过一件“负面的事件”。^③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全盘否定环境小说——包括探寻有关气候变化的小说,克里斯顿小说特别异乎寻常的是他超越了科学话语的领域(甚至在脚注引用科技文章,提供作者注指责真正的气候科学),然而这部作品出版前并没有经过同行的审阅。小说展示了克里斯顿讲故事的技巧,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垃圾”,在该书获得国家石油地质学家组织授予的“新闻奖”之后,斯坦福大学的气候学家斯蒂芬·H·斯莱德接受纽约时报主任科德里亚采访时如此评价该书。

在叙述气候变化故事时,有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可以用来处理信任的问题,而且是较为合法的方法。我认为,2001年苏珊·嘉纳斯在她小说《碳梦》中提出了这个方法。我特别欣赏这部小说的原因是:它敦促读者思考科学合适的社会角色,而不是仅仅就气候变化的纷争提出一个特别的观

①Ross Gelbspan, *The Heat is On: The Climate Crisis, The Cover-up, the Prescription*, Reading, MA: Perseus, 1997, p.52.

②威廉·K·史蒂文斯注意到,在《气候变化:人们、天气和气候科学》(*The Change in the Weather: People, Weather, and the Science of Climate*)一书中,“林德真已经喜欢灵硬牌气候变化模式”。

③通过《恐惧的状态》和在国会的作证,克里斯顿传播了“垃圾科学”并歪曲气候活动的政治学。他不仅仅简单质疑环境科学家的某些具体断言,而且质疑某些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的修辞夸张。在公众的想象中,他的评论实际上抨击了整个环境科学的原则,这使人联想到迪克斯·李·雷和罗·古佐依赖歪曲的科学。在罗赫略·马迪罗和拉尔夫·绍尔海默子1992年的书——《臭氧惊恐的黑洞:天空不会塌下来的科学证据》(*The Holes in the Ozone Scare: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the Sky Isn't Falling*)可见这一现象,其他的书还有《破坏星球:科学能够怎样帮助我们对付酸雨、臭氧层减少和核废料等》(*Trashing the Planet: How Science Can help Us Deal with Acid Rain, Depletion of the Ozone, and Nuclear Waste (Among Other Things)*, 1990)、《环境的超量摧毁:常识到底怎么了》(*Environmental Overkill: Whatever Happened to Common Sense?*, 1991),这些臭名昭著的传播怀疑种子的作品是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拉什·林博和福克斯新闻攻击气候和臭氧层科学的主要依据。雷和古佐在《破坏星球》一书中断章取义臭氧层的科学,严重损害了科学的可信度,正如诺贝尔获得者、大气层化学家舍伍德·罗兰所说:“我的信息要赶上他们的歪曲很难。”(Donella Meadows, 2008)

点。对于环境文学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角色(让读者思考)。小说讲述一位年轻的女拉丁裔美国科学家的故事,该科学家研究古气候学(通过采集海底的核心标本研究古气候学),她的研究意外地将她引入目前关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纷争。小说并不是仅仅用间接、简单的方法支持充满政治意愿的全球变暖问题,小说同时也探寻了科学家的困境,科学家只是想了解地球自然历史,但她试图避免从发现中断言今日的环境问题。但是,其他的科学家却利用她的发现,他们认为这些人是故意误读她的数据以达到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的目的。因此,嘉纳斯被迫卷入一场公共大讨论,这完全违反她自己的意愿。嘉纳斯在小说中探讨了科学在当代社会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一样都不可能被动旁观,忽略我们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具有政治蕴含,由此作者告诉了我们一个气候变化的故事。虚构的古气候学家克里斯蒂娜·特丽莎·艾莉娜斯坚持,秘密的研究的确与今日的热门话题有关,但她不愿意参与一群科学家为了权利,为了获得公众的注意,为了资金而引起的争论。艾莉娜斯开始似乎过分强调科学的中立性,她谨慎的态度以及谨慎对待观点的承诺,使之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角色。

科学没有立场。科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假如我需要与媒体交流,那是由于我需要交流。我不知道时,我不能说我知道。当知识不是绝对时,我不能使知识成为绝对。我可能想象的或梦想的或甚至觉得正确的都无关紧要。我只能重复数据所说的,科学是什么就是什么……^①许多人会争辩,即使是科学家也是根据有意和无意的意识形态来选择研究题目(和解读数据),但是当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力量时,科学家在解释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时候,就能更好地避开政治和个

人倾向。尽管不愿意,嘉纳斯的主人公还是逐渐意识到公众和媒体渴望了解地球的大气层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她对海底古核心标本的研究可能为二氧化碳和气候的关系提供某种微妙的线索。她的权威和说服力是通过执着的观察和谨慎的推理、总结,而不是通过修辞的游戏,浮夸的逻辑跳跃,或者两极化恶棍与英雄来建立的。嘉纳斯叙说了科学故事,说明了严谨观察研究与批评性的思维相结合能支撑起一个具有政治色彩,但不仅仅只是政治工具的人文学科。

最后,让我再问一次:“当我们星球未来的可居住性受到威胁时,我们是否该如此容忍危险呢?”为什么还需要让那么多美国人——活动家和作家丽贝卡·索尔妮特(Rebecca Solnit)——用如此长的时间“恐怖地看着我们的国家”,我认为,我们过分容忍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险,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普通民众——似乎不能理解科学论点和科学不确定性的自然属性。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说,政治家和科学家要是亏欠某特殊产业,还有文学艺术家带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立场)可以夸大和扭曲不确定性的合理形式,这是给大量的科学证据造成怀疑的阴影,破坏公众对科学证据应有的信任。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随处可见,全身心致力于研究气候变化过程和影响的科学家比较不容易妥协,而那些从企业获得研究资金的科学家却比较容易妥协,这些企业低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险能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从言论自由的智囊团那儿也能获得好处。戈尔问我们为什么能如此容忍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危险,索尔妮特宣称她“恐怖”地看着美国人的冷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麦克·克里斯顿恐怖地看着‘西方国家已经变得惶恐不安和对危险表现的歇斯底里’,^②并宣称我

①Susan M. Gaines, *Carbon Dreams*, Berkeley, CA: Creative Arts, 2001, pp.334-335.

②Michael Crichton, *State of Fear*, p.589.

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安抚虚假或微不足道的恐惧”。

不能理解信任是如何发生的(或者也许利用信任的心理并积极寻找破坏公众对气候科学的信任),克里斯蒂通过他深受欢迎的小说《恐惧的状态》成功地强调了公众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对谨慎科学的不信任。通过在参议院的作证,他已经含蓄地把他的不信任带入立法竞技场。据此,克里斯顿成了这十几年反环境运动“brownlasher”^①的宠儿,诸如约瑟夫·巴斯特(Joseph Bast)(《生态理智:环境主义常识指南》(*Eco-Sanity: A Common-sense Guide to Environmentalism*)一书的作者)在2005年一篇题为《恐惧的状态,麦克·克里斯顿和激进环境主义的终结》(*State of Fear: Michael Crichton and the End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的文章中兴奋地说:“正是由于胆小的小预言未能实现,公众对激进环境主义的支持正在萎缩,过时的大政府意识形态使它远离政治主流。但是,克里斯顿出色

的书可能标志着终结也是一种开始,一场‘新环境运动’的开始,这场运动把科学置于意识形态之前,每个人的合法利益优先于少数人的政治生涯。”尽管嘉纳斯一类的作家努力为公众描绘一幅较为现实的图画,展示科学家是如何工作和思考,但恐怕美国小说家关于气候变化的主题记录非常不明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文学上的成就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当我们思考纪实小说的书写,如比尔·麦克斯宾(Bill McKibben)、加莱·克里斯坦森(Gale Christianson)、麦克·莉纳斯(Mark Lynas)、罗斯·格尔比斯潘、威廉·史蒂文斯、阿尔·戈尔、伊丽莎白·卡尔伯特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的成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那将是另一篇文稿的内容。^②(本文中中文翻译版权已由作者授权本刊。)

责任编辑:王俊晔

①“brownlash”和“brownlasher”是被创造出来的新词,专门用在环境的语境中,“brown”是贬义词,与“green”形成对比,“green”是“环保的”,那么“brown”就是“不环保的,反对环保的”。这一术语来自《出卖科学与理智:反环境修辞威胁我们的未来》(Mark Lynas),1996年由保尔·艾莉希和安妮·艾莉希创造。他们如下释义“brownlash”:“‘brownlash’是由一个人和组织构成的多样化群体而产生,毫无疑问,这群体有不同的动机和背景,我们根据他们的言论将其分类,而不是根据他们是谁。这些人通常有可靠的和吸引人的消息来源,这使他们成功地在新闻记者、决策者、自由的民众中就人口过剩、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大大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现实及这些现象的重要性播下怀疑的种子。(p.1),除了迪克斯·李·雷和罗·古佐的作品以及麦克·克里斯顿的《恐惧的状态》,播撒怀疑种子的著名作品包括罗纳尔多·贝利的《生态阴谋》(*Eco-Scam*,1993),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的《在地球上的片刻:环境乐观主义时代的到来》(*A Moment on the Earth: The Coming Age of Environmental Optimism*,1995),和比约恩·隆博格的《怀疑的环境论者:思量世界的真实状态》(2001),还有《冷却它:怀疑的环境论者全球变暖指南》(2007)。

②在我的另一篇文章《气候变化的故事:科学、叙事和社会行为》(*The Story of Climate Change: Science, Narrative, and Social Action*)中,我已经更加详细书写这一主题,包括《难以掩盖的事实》(*An Inconvenient Truth*)这一故事的修辞策略,文章已收录在我的文集——《远行深思:入世、出世与生态批评的责任》(*Going Away to Think: Engagement, Retreat, and Ecocritical Responsibility*)(2008)中。